

诸葛亮

与

三国文化

(三)

谢 辉 罗开玉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百
年
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国文化
(三)

谢辉 罗开玉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谢辉,罗开玉主编.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9

ISBN 978 - 7 - 5364 - 6878 - 8

I. 诸… II. ①谢… ②罗… III. ①诸葛亮(181~234) - 人物研究②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 三国时代 IV.
K827 = 362 K23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663 号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

主 编 谢 辉 罗开玉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吴 强
版式设计 梁 成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张 20.75 字数 530 千 插页 1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9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364 - 6878 - 8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电话/(028)87734035

邮政编码/610031

网址:www.sckjs.com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三)》

编委会

主 任 谢 辉 丁 浩

编 委	方北辰	沈伯俊	张丽君
	严瑞海	姚 菲	罗开玉
	李亚红	吕一飞	罗新本
	高大伦	杨荣新	段 渝
	刘新生	江章华	许蓉生
	刘蓬春	李兆成	梅铮铮
	贺 游		

主 编 谢 辉 罗开玉



目 录



『史学研究』

我说武侯治蜀	易中天	1
秦汉三国时期的巴蜀宗教	罗开玉 谢 辉	17
秦汉三国时期巴蜀民族文化初论	罗开玉	30
三国蜀汉土著豪族初论	罗开玉	104
诸葛亮“营南北郊于成都”考	罗开玉	121
诸葛亮、李严权争研究	罗开玉	131
蜀汉行政建制研究	罗开玉	145
《三国志·诸葛亮传》札记	方北辰	164
诸葛亮《自表后主》考析	谭良嘯	185
论刘备的知人待士	李兆成	194
汉末三国的游学	卫永锋	205
诸葛亮与蜀汉廉政建设初论	罗开玉 谢 辉	219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再探索	梅铮铮	231
论魏晋南北朝的车阵与诸葛亮八阵图	李兆成	244
试论端午节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转变 ...	陈 颖	271
读“妾无副服”札记	李兆成	278
《史记》与《三国志》考辨	陈 颖	285
木牛、流马研制现状及问题	赵 彬	291

『三国遗迹』

寻访古三国	丁 浩	304
简阳“张飞像”考察记 ...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赴简阳考察小组		315

“螺矶传说”考析	符丽平	320
试析成都部分三国遗迹的消亡	奚 奕	334

『三国演义及影响』

诸葛亮形象三辩	沈伯俊	343
诸葛亮形象的道家化及其影响	李兆成	355
曹丕《与吴质书》解读	梅铮铮	375
论“桃园结义”及对后世的影响	梅铮铮	384
天命观与《三国演义》孔明形象塑造	符丽平	397
清王朝崇拜关公论	梅铮铮	406
试析宋元民间叙事文本中的张飞形象	符丽平	421

『三国文物研究』

蜀汉钱币探微	安剑华	433
论“诸葛鼓”	安剑华	449
从铭文看三国时期弩机的制造和管理	安剑华	457
曹操与“袞雪”	张 东	467

『武侯祠及文物』

“5·12”特大地震武侯祠纪实	谢 辉	卫永锋	475
孔明苑——博物馆陈列尝试	谢 辉	梅铮铮	481
清初道士张清夜与武侯祠	梅铮铮		490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塑像馆腐蚀损失调查报告 ...	贺 游		504
清代以来惠陵附属建筑修葺考	李兆成		520
成都武侯祠碑碣沿革考	李兆成		538

『武侯祠相关民俗』

“游喜神方”习俗考	罗开玉	645
-----------------	-----	-----

后 记		659
-----------	--	-----



我说武侯治蜀

易中天



『史学研究』

一、怎样看“攻心联”

在2006年元宵节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播出的《品三国》第一集中,我根据自己的理解谈到了成都武侯祠的“攻心联”,认为此联其实委婉地批评了诸葛亮的治蜀。此言一出,舆论哗然,甚至被斥为“硬伤”。是不是“硬伤”,可以讨论。因为对于此联的理解和解释,学术界原本就有不同意见,并非众口一词。但当真要说清楚,也不容易。在一期电视节目里说清楚,就更不可能。因此,我重新录制了《品三国》的开场白《大江东去》,把这个问题暂时挂了起来。现在,52集《品三国》已全部录完,该给大家一个交代了。

那就从头说起。

我们知道,所谓“攻心联”,是清人赵藩所撰,悬挂于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前的一副对联。因为它的第一句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因此被后人称之为“攻心联”,也称“能攻心联”。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有对这一名联的研究论文集,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02年12月出版,书名就叫《“攻心”联与赵藩》。所以,“攻心联”这一简称,是研究者们发明的,且已为学界认可,不是谁的“硬伤”。赵藩撰写此联的起因和动机,也没有争议,就是以古论今,对当时的四川总督岑春煊进行劝谏。问题在于,赵藩的“以史为鉴”,究竟是以什么史实为鉴?这就正如《“攻心”联与赵藩》一书的《序》所言,关系到对蜀汉政权、对诸葛亮的基本认识和评价,而



且“学术界存在着分歧”。为此,我们必须先来看看原文。

此联的全文是: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很明显,这是批评,是告诫。而且,这些批评和告诫,就是针对岑春煊的。因为此人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既不能“审时度势”,又不能“攻心为上”,自然是“宽严皆误”。难怪岑春煊看完此联后,脸色难堪,一言不发,赵藩后来也被贬到了永宁。但赵藩这个人,既是岑总督的老师,又是岑大人的幕僚。以这样的身份,并不可以直接批评,只能借古人说事。那么,“攻心联”中所说之古人,究竟是谁?

标准答案只有赵藩能够给出,可惜我们问不到。从这个意义讲,任何学者的解释便都是“猜测性意见”,任何人也都不能以权威自居,把不同意见说成是“错误”的。此其一。第二,正因为大家都是猜测,因此不能先定调子,设立禁区,相反必须解放思想。第三,即便是猜测,也不能想当然,必须讲逻辑。怎么讲逻辑呢?先找关键词,再行排除法。“攻心联”的关键词是什么?有说是“攻心”的,有说是“好战”的,有说是“审势”的,有说是“宽严”的。这些都对。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治蜀”,因为它是写给“治蜀者”(岑春煊)看的,讲的也是“治蜀”的事。“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句,是结尾,也是点题、落实。所以,“治蜀”是此联的关键词,“攻心联”也应该叫做“治蜀联”才更贴切。

找出这个关键词,搜索的范围也就确定了。赵藩联中的古人,肯定是三国时期的治蜀者。那么,是刘焉、刘禅,或者蒋琬、费祎、姜维等等吗?多半不是。因为拿他们说事,意思不大。有意思的,只可能是举足轻重的三个人:刘璋、刘备、诸葛亮。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地看。

是刘璋吗?有可能。因为刘璋的治蜀,一般认为是失之于“宽”的。但刘璋只是“过宽”,并不“过严”,不能说他“宽严皆



误”。再说他也不“好战”。所以，即便“攻心联”里有刘璋的份儿，那份额也不会太多。

那么，是刘备吗？也有可能。因为刘备毕竟发动过夷陵之战。硬要扣帽子，可以算是“好战”。但刘备发动这场战争要达到的目的（夺取荆州或者为关羽报仇），可不是靠“攻心”就能实现的。所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在这里并不适用。至于不能“审时度势”，这个错误刘备倒是有的。具体表现，还是夷陵之战。但那只能叫“不审势，即进退失据”，不能叫“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宽严皆误”的问题，刘备有没有？有一点，但不严重，且能调整。据《三国志·简雍传》，有一年，天旱无雨，益州歉收。刘备为了节约粮食，下令禁酒。这当然是对的，但下面执法的人做得有点过分。在老百姓家里搜出了酿酒的工具，也要当作违法酿酒来处分。正好简雍和刘备一起外出散步，看见一对男女同行。简雍就说，他们要通奸，怎么不抓起来？刘备说，你怎么知道？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呀！这和家里放着酿酒的工具，不是同样的罪过吗？刘备听了哈哈大笑，立即就放了家有酿酒工具的人。这总不能说是“宽严皆误”吧？

不是刘璋，或主要不是刘璋。不是刘备，或主要不是刘备。被赵藩借来说事的，就只能是诸葛亮，或主要是诸葛亮。这也并不奇怪。“攻心联”毕竟悬挂在武侯祠诸葛亮殿前。诸葛亮不唱主角，谁唱？

这其实也没有争议。争议仅仅在于，赵藩对这位主角，或者说，他对武侯的治蜀，究竟是肯定呢，还是批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是肯定，而且是全面肯定。具体地说，就是上联肯定诸葛亮的南征孟获是“攻心为上”，下联肯定诸葛亮对法正宽，对马谡严，均无失误。这当然也讲得通，但总觉得有些别扭。因为赵藩撰写此联的目的，是要委婉地批评和告诫岑春煊。通过赞扬诸葛亮来批评和告诫，当然也行，但总不如通过批评某个人来得有力。何况“不审势，即宽严皆误”一句，明摆着就是批评的口气。赵藩是不能直



接批评岑春煊的,只能“指桑骂槐”。如果那“桑”不是诸葛亮,能是谁,该是谁?遍查蜀史,怕是找不到比这位名相更大的“桑树”了。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诸葛亮的治蜀。我一再说过,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是当时治理得最好的国家。但同时,它又是最早灭亡的政权。这就说明,治理得最好,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找出这些问题,总结这些教训,比一味地讴歌和颂扬,将更有益于我们今天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要讨论“攻心联”的真正原因。

那么,诸葛亮他有问题吗?

二、治蜀问题何在

先看诸葛亮都做了些什么。

从建兴元年(223)受托永安,到建兴十二年(234)病逝军中,诸葛亮在蜀汉执政十一年。此间,他主要做了四件大事,即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这四件事,都在《隆中对》的规划之中,可谓“既定方针”。至于结果,则有成有败,有得有失。最成功的是东和孙吴。直至蜀汉灭亡,两国关系都相当之好。后来曹魏大军兵临城下,蜀汉朝廷还有人主张投奔孙吴。最不成功的是北伐。对于诸葛亮的北伐,吴人张俨的评价是四个字:“空劳师旅”(《默记》)。今人田余庆先生的评价也是四个字:“积年无成”(《〈隆中对〉再认识》)。其实此事岂止徒劳无益,简直就是劳民伤财。用张俨的话说,就是“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默记》),实际上加速了蜀汉的灭亡,所以是最不成功。

这就让我突发奇想:赵藩联中“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一句,莫非说的就是北伐?

此言一出,肯定有不少人嗤之以鼻。因为谁都看得出,赵藩这话说的是“内战”,不是“外战”。为什么呢?因为有“反侧”二字。



什么是“反侧”？就是“不安”。民不安，就叫“反侧之民”。心不安，就叫“反侧之心”。心存“反侧”，就不是“顺民”。因此要“攻心”，让他们“安下心来”臣服。那么，这里说的“反侧”能是指曹魏吗？当然不可能。曹魏之于蜀汉，不是“反侧”，而是“敌对”。对付曹魏，也只能靠“武器的批判”，“攻心”（说服教育或怀柔政策）是没有用的。

那么，诸葛亮要“攻”谁的心？

通常的解释，是“南中”的“夷越”，也就是孟获那些人。他们原本是不肯臣服的，对蜀汉也是存有二心的。这就是“反侧”。后来，诸葛亮南征时，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孟获等人七擒七纵，不杀不辱，终于使他们心悦诚服，宣称“不复反矣”（《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攻心联”的上联，说的就是这件事。

这当然完全讲得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第一，南定夷越在诸葛亮所做的四件大事中，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是东和孙吴、北伐曹魏和内修法制。第二，南抚夷越的实际效果，也并非如《汉晋春秋》所说的那么好。这也是学术界早就有人指出过的。比如缪钺先生在《三国志选注》的《前言》中，就说“诸葛亮征南中事，当时传说不免有夸大溢美之处”，而且明确指出七擒孟获“不合情理”，南人不反“不合事实”。何兹全先生的《三国史》，也用《三国志》之《李恢传》、《马忠传》、《张嶷传》中的大量材料，证明诸葛亮北还后，南中的叛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后来曹魏大兵压境，刘禅打算逃往南中，谯周就说去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南方远夷”的臣服，是丞相用武力逼出来的（兵势逼之），并不可靠。而且，他们臣服之后，反倒要多交赋税，就更是心怀不满，甚至充满仇恨（以为愁怨），因此随时都可能暴乱（见《三国志·谯周传》）。看来诸葛亮的“攻心”，并没有收到“反侧自消”的效果。这个未必成功的事例，怎么能用来劝谏岑春



煊?

然而诸葛亮进行的战争,除了南征,就是北战。所谓“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是指南定夷越,也就只能是指北伐曹魏了。

其实讲通这一点并不难,只要弄清楚诸葛亮北伐的真正原因就行了。前面说过,诸葛亮的北伐,其实是不成功的。不成功的原因也有三条,我在《品三国》(下)的《以攻为守》一集讲过,即: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这三条,至少前两条,诸葛亮应该是心中有数。何况《隆中对》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北伐灭魏的时候?

于是问题就来了:既然如此,诸葛亮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进行北伐呢?

答案就在《出师表》。《出师表》一开始就说:“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是实话。也就是说,诸葛亮出师北伐,是因为蜀汉政权受到了威胁。那么,威胁来自何方?来自孙吴吗?不是。诸葛亮执政后,吴蜀盟好已经恢复,双方和平共处,相安无事。来自曹魏吗?也不是。赤壁之战后,曹魏从来就没主动攻打刘蜀。反倒是,刘备攻汉中,关羽围襄樊,孔明出祁山,屡屡挑衅。所以,这笔账也不能算在曹魏头上。曹魏不进攻,孙吴没威胁,所谓蜀汉政权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就只有一种可能——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套用孔子的一句话说,就是吾恐诸葛之忧不在曹魏,而在成都城中也。

实际上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讲过,诸葛亮的坚持北伐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理想必须实现”,二是“小国更要图强”,三是“安内必先攘外”。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一个国家,如果处于战争状态,管理和治理起来就顺手得多。要整治或者镇压反对派,也便当得多。想当年,执掌鲁国国政的大夫季孙,就曾经因此而准备进攻鲁国的附庸颛臾,所以孔子才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箫墙之内也”



(《论语·季氏》)。不过诸葛亮和季孙氏的情况并不相同。季孙攻颛臾是以强凌弱,诸葛伐曹魏是以弱抗强。季孙之忧在鲁君,故曰“簞墙之内”;诸葛之忧则不在刘禅,故曰“成都城中”。那么,让诸葛亮感到忧心忡忡的,究竟是哪些人呢?

三、谁有“反侧之心”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蜀汉政权的内部结构。

我在《品三国》(下)多次说过,刘备、诸葛亮建立的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种是“本土势力”,包括原仕洛阳的益州官僚和仕于益州的本土豪强,我们统称之为“益州集团”。第二种是“刘璋旧部”,包括追随刘焉父子入蜀的和后来投靠刘璋的,我们统称之为“东州集团”。第三种是“刘备亲信”,包括刘备的骨干(如关羽、张飞)和后来投靠刘备的(如马超),我们统称之为“荆州集团”。这三股力量,由于有先来后到的原因,就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主客新旧关系。简单地说,益州集团是主是旧,荆州集团是客是新,东州集团夹在当中,既是新是客(相对于益州集团),又是旧是主(相对于荆州集团)。这就已经够麻烦的了。更麻烦的是,新来的“客人”又总是要压制旧有的“主人”。刘璋的东州集团要压制益州土著,刘备的荆州集团则不但压制刘璋的东州旧部,更压制益州的本土豪强。结果便形成了一种“鸡尾酒”似的结构:刘备的荆州集团在最上层,刘璋的东州集团在中层,益州的土著集团在最低层。这就是蜀汉政权的大体状态。

这可真是地地道道的“反客为主”、“后来居上”。将心比心,作为过去的“主人”,此刻的“奴仆”,益州集团决不可能打心眼里喜欢蜀汉政权。他们的“蠢蠢欲动”和“图谋不轨”,几乎是必然的。再加上刘备在猇亭和夷陵一败涂地,就使形势更加严峻,正所谓“刘备建国,基础不牢;夷陵战败,地动山摇”。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研究员罗开玉先生统计,从建安二十三年(218)到延熙十三



年(250),益州土著豪强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竟达九次之多(《“攻心”联再研究》),蜀汉政权可以说是坐在了火药桶上。

土豪“武卫”,名士“文攻”。一些益州名士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猖狂攻击蜀汉政权,扬言只有曹魏才能一统天下。比如张裕就公开说“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三国志·周群传》);周舒则说“当途高者魏也”(同上引),意思是取代东汉的当是曹魏。杜琼还进一步做出解释,说是“名官尽言曹,吏言属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三国志·杜琼传》)。譙周则拿刘备父子的名字做文章,说“备”的意思就是“足够了”,“禅”的意思就是“让出去”,“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同上引)。这些言论,都被陈寿记录在案,可见当时议论之多,足以蛊惑人心形成“反侧”,成为刘备、诸葛亮执政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诸葛亮显然意识到了,而且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成为蜀汉政权领导核心后,很注意从益州集团中选拔人才。比如杨洪,犍为武阳人,就是诸葛亮一手提拔的。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所以当时的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这是记载在《三国志·杨洪传》正文中的,不是野史,应该可靠。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佩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张裔对诸葛亮,可谓心悦诚服,推崇备至,赞不绝口。他到处对人说,但凡在诸葛亮领导下的,都会奋不顾身地忘我工作(参看《三国志·张裔传》)。这也都是实话。实际上就连那些反对派,也不一定反对诸葛亮。比如前面说的那个譙周,就反汉不反亮。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第一个跑到前线奔丧的就是他。但这并不妨碍他“颠覆”蜀汉政权,也不妨碍他“诱导”刘禅降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诸葛亮本人威望高,人品好,工作做得多,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益州集团,始终是蜀汉朝廷必须面对的“反侧之民”。

原因也很简单:无论诸葛亮怎样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也



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我们不妨看看刘备、诸葛亮信任重用的都是什么人。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不算，其他的如庞统，荆州襄阳人；法正，扶风郿县人；许靖，汝南平舆人；糜竺，东海朐县人；董和，南郡枝江人；魏延，荆州义阳人；杨仪，荆州襄阳人；马谡，襄阳宜城人；蒋琬，零陵湘乡人；费祎，江夏鄢县人；姜维，天水冀县人。这些人有的属于荆州集团，有的属于东州集团，但都不是益州人。当然，益州土著也有受信任的，比如费诗，犍为南安人；黄权，巴西阆中人；王平，巴西宕渠人。不过他们的受信任都要打折扣，或者先不受信任（如王平），或者后不受信任（如黄权），或者中间出问题（如费诗）。而且，即便被提拔，也到不了最高层。诸葛亮去世后，接班的三个人，蒋琬、费祎、姜维，便都不是益州人。益州土人不是傻子。这格局，他们还能看不明白？

何况他们早就把账算清楚了：蜀汉不过一州之地，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都有限。也就是说，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切蛋糕”的还不是自己人！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原本是“一等臣民”。刘璋时代，降为“二等”。刘备一来，又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所以，尽管并非所有的益州人都反蜀汉，但反蜀汉的却多半是益州人。比如周舒，巴西阆中人；杜琼，蜀郡成都人；谯周，巴西西充人；被诸葛亮杀掉的彭羸，广汉人；被刘备杀掉的张裕，蜀郡人；刘备时期装聋作哑“闭门不出”，好不容易被诸葛亮请出山来又“乞老病求归”的杜微，梓潼涪县人。他们清一色的都是益州人。



至于那些搞武装叛乱的,怕也都是。这些人,或者有权,或者有钱,或者有名,或者有人,势力大得很,不是南中的孟获等人可以相提并论的。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攻心”对象,就该是他们。诸葛亮要消除的,也首先是他们的“反侧之心”。

那么,这和“攻心联”又有什么关系呢?

四、是谁“宽严皆误”

这就要看诸葛亮怎样解决益州集团“反侧”的问题。

办法其实就是三个:任人唯贤、依法治国、北伐曹魏。这三条,应该说都很好。尤其是前两条,从理论上讲绝无问题。任人唯贤能有什么问题呢?难道要任人唯亲?当然不是。问题在于对“贤”这个字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和曹操是不同的。曹操的做法是“唯才是举”,诸葛亮的标准则首先是“志虑忠纯”(《出师表》)。这当然是对的。但具体到蜀汉,就会有些麻烦。比如前面说的那些反对派,算不算“志虑忠纯”呢?恐怕不算。其他那些益州人士,他们的“志虑”又是否“忠纯”呢?恐怕需要考验。不要说诸葛亮,就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就能担保没有“二心”。总之,荆州集团与益州集团之间,事实上是有政治隔阂和心理障碍的。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坚持“政治标准第一”,把忠于蜀汉政权放在首位,客观上就会妨碍许多益州人士的政治前途。所以,这一条,并不能消除他们的“反侧之心”。

北伐曹魏也不能。战争虽然能够起到转移注意力,加强凝聚力,提高执行力的作用,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打仗是要用钱的。这些钱,天上掉不下来,地上长不出来,刘备他们带不进来,只能向益州人要,而且主要靠益州的世家大族和土著豪强出。他们当然不乐意。所以,益州的“反对派”,几乎同时也是“反战派”。比如前面说过的谯周,便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仇国论》的“反战宣言”,明确指出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



穷兵黷武(极武黷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那个时候,可就“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三国志·谯周传》)!这话实在可以看作“从古知兵非好战”的注脚。

剩下的就是依法治国了。我一向认为,这是诸葛亮治蜀最精彩也最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陈寿的评价也非常高。他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评语,几乎通篇都在讲这个问题。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词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输,恶无纤而不贬。”这叫什么?这叫公开、公正、公平!结果是什么?是“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

这是有旁证的,旁证就在《三国志·张裔传》。张裔对诸葛亮的依法治国也有一个评价:“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企忘其身者也。”所谓“企忘其身”,就是奋不顾身。所谓“赏不遗远,罚不阿近”,就是公正、公平。也就是说,正因为诸葛亮公正公平,所以大家工作起来都奋不顾身。而且,这里说的远和近,也不只是当事人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更指是否属于荆州集团。也就是说,无论你属于荆州集团,还是东州集团,还是益州集团,该赏就赏,该罚就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正是诸葛亮能够有崇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张裔是蜀郡成都人,属于益州集团。他这么说,说明诸葛亮确实尽可能地做到了公平执法,并没有多么亏待益州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首先是“过严”。诸葛亮的执法之严也是有记载的。《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就说“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晋人袁宏的《后汉纪》也说“刘备克成都,诸葛亮为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与陈寿的评语“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公平,正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在“刑政